

永樂大典

編者 宋 王洙
纂修 宋 王洙

卷之九

中華書局

doceriver 文川
大社商標
在文川河裡有白龍潭 發現更多電子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馬蓉 陳抗 鍾文
樂貴明 張忱石
點校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

第一冊

中華書局

馬蓉 陳抗 鍾文

樂貴明 張忱石

點校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

第二冊

中華書局

馬蓉 陳抗 鍾文

樂貴明 張忱石

點校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

第三冊

中華書局

馬蓉 陳抗 鍾文
樂貴明 張忱石
點校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

第四册

中華書局

馬蓉 陳抗 鍾文
樂貴明 張忱石

點校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

第五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馬蓉等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
2004

ISBN 7-101-01137-3

I.永… II.馬… III.①地方志-中國-宋代
②地方志-中國-元代 ③地方志-中國-明代
IV.K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22861 號

責任編輯:王瑞來 柳 憲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

(全五冊)

馬蓉 陳抗 鍾文 樂貴明 張忱石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0³/₄ 印張·10 插頁·192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320.00 元

ISBN 7-101-01137-3/K·465

前言

《永樂大典》修纂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它是我國文化遺產中規模最爲弘大、卷帙最爲繁多的一部大型類書。全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凡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因功費浩繁，從未刊刻。明時原有正副兩本，後正本不知去向，副本流傳至清初，已佚二千餘卷。因清代統治者保管不善，官吏偷盜，逐漸亡散。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慘遭八國聯軍焚劫，絕大部分被毀，今存於世約八百餘卷。

《永樂大典》修纂之時，貫徹了明成祖「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各輯爲一書，毋厭浩繁」的雄偉企圖，（《明太宗實錄》卷二十一）將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種書籍一併輯入。據估計，收入典籍達八千餘種。很可惜，這些典籍至明萬曆年間，「已僅有十分之一」。（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抄永樂大典記》）經明末清初戰亂，存者更是寥寥，故不少亡佚的典籍，僅存於《大典》。

最早知道《永樂大典》價值的是清代雍正年間的全祖望。他在翰林院得見《大典》，讚其「或可以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僞書，……不可謂非宇宙之鴻寶也」，（同上）認爲可從中裒輯經、史、志乘、氏族、藝文五類典籍。全祖望輯出高氏《春秋義宗》等十種，其中有志乘類《永樂寧波府志》一種，這與他

鍾愛鄉梓文獻有關。乾隆中修纂《四庫全書》時，從《大典》輯出佚書三百八十五種。由於清統治者修纂《四庫全書》的目的在於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對宋元藝文着力較多，而對志乘幾乎摒棄不顧，僅輯出《嘉泰吳興志》、《淳祐臨安志》、《嘉定維陽志》、《嘉定鎮江志》、《至順鎮江志》五種，但亦未列入《四庫全書》。其後徐松又輯得《元河南志》，晚清文廷式、繆荃孫亦輯有《壽昌乘》、《永樂順天府志》、《瀘州圖經志》等。總的來說，清代對利用《永樂大典》輯佚方志未能重視，尤其在修《四庫全書》之時，《大典》尚為齊全，如果認真輯佚，至少可輯得志乘一千餘種，可惜有清一代只輯出十種，其中《嘉定維陽志》、《永樂寧波府志》輯出後又佚，今實存僅八種而已。

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張國淦先生方對《永樂大典》中的方志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輯佚，惜其時不少《大典》殘卷尚流散在異邦它域，難以得見，故輯本存在問題較多。簡而言之，缺點有三：一為應輯而未輯，如《金陵景定志》、《慶遠路志》、《雲南志略》等宋元古志，張氏皆遺闕未輯。其次編輯嚴重，如《諸暨志》輯得六條，漏輯七條；《太平州圖經》輯得五條，漏輯四條；《東郡志》輯得四條，漏輯六條；《建安志》輯得三十六條，漏輯十二條；《番陽志》輯得二十八條，漏輯十九條；《南雄路志》輯得二條，今卷六六五、六六六雄字韻兩卷，保存甚多。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第三，張國淦先生對明洪武、永樂年間方志，一概棄之不輯，這也是美中不足之處。儘管這樣，張氏是民國以來研究古方志最有成就的學者，惜其輯本未見刊刻，今天只能從他的《中國古方志考》得到一些綫索。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中華書局曾對現存於世的《永樂大典》殘卷作了認真細緻的調查，分別於

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八四年兩次影印出版，凡七百九十七卷。一九八六年又將以上兩次影印本合併刊印成十六開精裝本，凡十冊。近年又得知美洲、歐洲、亞洲一些公私藏家尚有《大典》殘卷十餘卷，為中華書局影印本所未收，經我們多方努力及海外友人的大力協助，終於取得複製件。這樣，筆者共掌握現存《大典》殘卷八百餘卷，這個輯本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共收九百種，即總志七種，方志八百九十三種，依今日之行政區域，北京市十三種，天津市三種，河北省二十九種，山西省二十四種，上海市六種，江蘇省六十八種，浙江省一百二十三種，安徽省五十六種，福建省五十一種，江西省一百四十三種，山東省十二種，河南省三十五種，湖北省三十九種，湖南省六十三種，廣東省七十七種，海南省十二種，廣西僮族自治區五十八種，四川省五十二種，雲南省三種，陝西省八種，甘肅省三種，不明地域者十種，外國五種。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現存於世方志有八千餘種，其中宋元方志僅四十種（包括清人從《大典》中輯出的八種），明志約八百餘種，其餘全為清代和民國間所修。《永樂大典》中的方志有兩個明顯特點：首先是數量多。現存《大典》殘卷方志九百種，這是一大批早已亡佚的方志，僅存於《大典》。一部類書能保存這麼多志乘，是絕無僅有的。正如全祖望說：「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為之，今求之《大典》，蓋然具在。」（同前）其次是修纂早。今存的九百種，其中可確定時代的宋元方志有一百七十多種，遠遠躍出今存宋元方志四十種之數，即使是明志，也修於永樂三年之前。明中葉以後修志者皆未見《大典》方志，無所依憑而「妄為之」，其修纂時間和史料價值無法與《大典》方志相匹敵。

長期以來，學術界未能對《大典》方志進行過研究和利用，有的專門論述方志的文章，對此亦視而不見。造成這種狀況，不外有兩個原因：一是中華書局未影印之前，一般學者難以得見《大典》；二是《大典》採取「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編輯原則，往往將同一方志分裂散割於多處，不便閱讀和研究。為此，我們編輯整理了《永樂大典方志輯佚》，並對其學術價值，簡介於後。

一、唐宋時期的科舉與教育制度史料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它肇始於隋代，此後各朝沿襲不廢。與科舉制度相應的《登科記》之類著作亦應運而生。唐代《登科記》亡佚已久，清人徐松曾廣採唐人科舉史實，撰成《登科記考》三十卷，其不少史料取之於《大典》中的方志，今尋檢方志，尚有徐氏採擷未盡者。《古藤志》云：「李進士堯臣，藤之秦川人。登貞觀七年第，累仕至交州刺史。同榜進士劉從仕知秦川縣，因率父老創橋南市，亦名登俊焉。」可知李堯臣、劉從仕皆為貞觀七年登進士第者。又如《南雄府圖經志》云：「孔閏，少聰敏，嗜學，年十九，唐景福初及第，官至朝散大夫、惠州司牧。」唐昭宗景福僅二年，「景福初」當指景福元年。今《登科記考》皆不載李堯臣、劉從仕、孔閏，可據補。

宋人《登科記》今僅存《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寶祐四年登科錄》兩種，而《大典》方志中宋人科舉史料極為豐富，《南雄路志》有「進士題名」一門，記宋仁宗天聖二年（一〇二四）至南宋度宗咸淳七年（一二七二）南雄路保昌、始興兩縣各榜進士田繼勛等四十五人，又「特科」欄有南宋淳熙戊戌（一一七八）載

現以下六十二人。又如《臨汀志》「進士題名」下記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九七八）至開慶元年己未（一二五九）臨汀各縣進士及第者。其他方志《人物》門中所記宋人登科事跡也極多，如《泉州清源志》陳豐條云：「陳豐字元齡。曾大父補，父駢，俱第進士。豐雖延賞入仕，少有場屋聲，銓闈廣漕俱魁選，兩試詞科，時輩稱之。……弟登、子玠，亦第進士。」僅此一條，記陳豐等登進士者五人。《清漳志》蘇竦一條，記蘇竦及其門生登第者楊志、李慤、郭宗復、梁傳、黃擇、黃敬、顏載、王度、林如安等十人。像方志那樣專門列有「選舉」、「進士題名」等欄目，既集中又準確記叙一地科舉及第姓氏，是其他典籍所沒有的，也是無法取代的。假如編寫一部《宋登科記考》的話，《大典》方志中的科舉史料，無疑是重要的依據。

與科舉制度有關的學校，方志中記載亦較多，以福建等地最爲突出。唐德宗之前，閩地因遠距中原，教育極不發達。《唐語林》卷四云「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云。到了南宋，由於統治者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注重，視「學校爲風教之本」，學風大盛，以致福州「城裏人家半讀書」，《輿地紀勝》卷一二八程師孟詩「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方輿勝覽》卷十呂伯恭詩《建安志》所收王遂《重建府學記》云：「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莆陽志》有黃公度、王邁、張邦用、鄭子充、張如愚、顧若愚等人所撰學記，詳記莆陽教學之普及。黃公度《興化府學記》云：「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爲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張邦用云：「衿佩鏘如，弦誦紛如，來歌來游。」由於教育普及，莆陽雖蕞葺小地，但「多出魁文韻士，爲中州冠」。《新定續志》有南宋鄉

飲儀式的詳細描述。諸如此類，都是研究我國宋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資料，同時對今日推廣和普及文化教育事業和培育優秀建設人材也會得到啓益。

二、農田水利史料

農業的豐歉，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和人民的生計，故農田水利建設歷來「牧民者以爲重」。（《餘干志》）南方丘陵地帶，「山澤相半，田依山者多高亢，依澤者多窪下」，（同上）每逢久旱或霖雨，時有旱澇之災。唐肅宗時顏真卿官饒州刺史，根據丘陵地形，在臨川、崇仁等地「建土塍陂」，廣築陂塘。其後顏真卿外甥韋丹官江西道觀察使，又「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新唐書·韋丹傳》）陂塘使山區梯田「早有水之利，澇無水之害」，（《餘干志》）除江西之外，在安徽、福建、湖南、浙江等地也普遍興建。《臨川志》記有陂塘八百餘所，《宣城志》云「總一邑陂塘，幾八百所」。《涇川志》記有二百餘所，《秋浦新志》記有四百餘所，其他如《池州府志》、《清源志》、《章貢志》、《武陵圖經》均有記載，并兼叙修築人員、工費及溉田數字等。陂塘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重要水利設施，也成爲方志記述的一項內容。

除陂塘外，還有一種斗門的水利設施，具有「儲其不足，洩其有餘」的功能，（《温州郡志》）主要修建在沿海地區。《温州郡志》云：「溫地負山瀕海，水自渚山溪源達於河，合流於江入於海。洩而不蓄則旱，蓄而不洩則澇，旱澇皆爲民田害。故水勢大處則立斗門，小處則立水閘，以時啓閉。」這種斗門和水

閘，有「上蓄衆流，下捍潮瀾」的作用。僅温州一地，斗門達一百六十三處。福建莆陽一帶利用斗門控制江水與海潮，與海爭地，「埤海爲田，頃以萬計」，（《莆陽志》）使這些耕地「雖水旱不能爲沴，農甚便利之」。（同上）在邊遠的廣東高州吳川縣，因「水道狹隘曲折，潮長則舟航可度，潮退砂磧淺露」，（《高州府圖經志》）當地建立了海限門，提高水位，以便船隻航運。

三、倉廩史料

蔡邕《月令章句》云：「谷藏曰倉，米藏曰廩。」（《大典》卷七五〇六「倉」字總叙）我國古代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層政權，皆有倉廩，構成一套完整的倉廩系統。今《大典》「倉」字十餘卷中的方志，記自宋至明初州府縣各地倉廩甚多，有省倉、州倉、常平倉、州儲倉、平糶倉、均糶倉、支移倉、轉般倉、州濟倉、都倉等等，它起着貯藏、運輸、平糶等作用，但最大的作用在於平定糧食價格。每當「冬月穀賤之時，照時價收糶」；春夏谷貴之時，從元價出糶」，「期以平在市之米價，濟小民之艱食」。（《宣城志》）每遇水旱災害，亦「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儲」。除貯藏糧食的倉廩外，還有貯存茶葉、食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倉廩，同樣起着「賤而糶，貴而糶」，平定市價，安定百姓生活的作用。

以上倉廩爲國家所有，未經允許，不准動用，必需「有請於朝於部使者而後得之」，而「涸澈之民」一日不得食，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故當地百姓又集資合辦社倉、義倉、舉子倉等，「遇歉發以予民，如探篋筍中物，隨取即獲」，「官不干預」，（《宜春志》）以便及時賑濟災民。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倉廩制度既是國家財政系統的重要措施，也是統治者緩和階級矛盾的工具，它對宋代以後社會發展商品經濟起過良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弊病，「歲久弊生，或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敢散」，《瑞陽志》更有甚者，「鄉官非人，與吏爲奸，冒佃隱輸，虛支詭貸，色色有之，民始不沾實惠者矣」。《延平志》反而淪爲壓榨掠奪人民財產的工具。

倉廩制度時興時廢，延綿千載，而史學界研究與論述甚少，唐代倉廩制度尚有張弓同志《唐朝倉廩制度初探》，自宋之後，尚屬史學領域裏的荒園，有待墾耕。《大典》方志除記倉廩作用外，像《宣城志》、《建安志》、《延平志》、《宜春志》、《瑞陽志》、《新安志》等還記有倉廩的地址、方位、貯藏數量、管理規則、興廢經過等，它對研討宋以後倉廩制度和救荒史是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

四、地震史料

地震是最大的自然災害，我國是最早用科學儀器觀察和記錄地震的國家。爲更好地掌握地震規律，預報地震，發展工農業生產和保障人民安全，中國科學院先後彙編了《中國地震年表》、《中國地震資料彙編》，其史料主要取之於正史《五行志》及明清方志，而未利用《永樂大典》。其實《大典》方志中也保存着有關史料，如《清漳志》云：「雙門……淳熙十二年地震，門壞。宋黃啓宗重建七間，去中亭及翼樓，揭州額於樓前欄。」這次發生在漳州的地震，《宋史·五行志》却没有記載。

五、礦產資源史料

我國礦產資源豐富，古代勞動人民很早就對各種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志中記載較多。地質學家章鴻釗先生曾據方志史料輯為《古礦錄》，地質部也編有《祖國二千年鐵礦開採和鍛煉》、《中國古今銅礦錄》等，但亦未利用《永樂大典》。今《大典》方志記載了礦產的分布并兼叙宋、金、元、明初對礦產的開採、質量、產量、廢棄等，內容十分豐富。僅以《太原志》所載為例：

金礦：「金冶一處，在繁峙縣東北義興嶺，中統二年水淹沒，今摧塌。」

銀礦：「銀洞在代州南六十里，今已摧塌，有宜同冶，洞眼自屬於官，不曾與煽。」

銅礦：「銅出州南六十里鳳遊谷，今已摧塌。」

錫礦：「錫出縣一佰三十里。」

鐵礦：「鐵在縣東五十里出寶山前。元系坑首周子貴自行煽煉，認辦課程，自壬辰離亂後荒廢。洪武二年，周宗仁等赴官供報，認辦課程三千文。洪武五年，知縣郭進赴省府計稟，增辦冶事，隨地之利，分置爐辦生鐵七十餘萬斤解官。」

「鐵，《晉陽志》云：在縣東北皇陵上莊，今無。」

「青鐵，出交城縣西北山大通冶。」

「黃鐵，出於縣北一佰二十里，元朝不曾煽煉，亦不知去處。」

「黃鐵冶，在靜樂縣北六十里雁門村，今摧塌。」

「鐵冶一處，在榆次縣罕山南，金末時煅煉，元廢，今微有遺跡。」

「鐵冶一處，在平定州西南二十五里，久廢無跡。」

《太原志》記載煤炭資源最爲詳盡，共記明初之前煤窖太原縣有五十七座，陽曲縣有三處四座，清源縣、孟縣各三座，平定二座，榆次及交城各一座。現存《太原志》的最早刊本爲明嘉靖間所修，却没有以上內容。

此外《建武志》、《湟川圖志》等還有水銀、硃砂、信石、蘆甘石、礬等礦產的記載。

有關礦泉的記載亦甚多。有適合於飲用的，如《古藤志》云：「注玉泉，在州城西南間，涌水味清冷，甘香可愛。」《臨汀志》云：「東庵泉，在清流縣庵山之麓，清冽勝於他泉，最宜烹茗。」有適合於釀酒的，如《臨汀志》云：「桂山泉，在州東山東下，自石竇出，色白如乳，味甘若飴，最宜釀酒，清味倍於他水。」有適合於治療疾病的，如《南雄路志》云有暖水二，「一在保昌縣西二十里，源出楊歷山，四時常溫，以爲名；

一在始興縣躍溪園，其水如湯沸，大寒亦暖，以生物投之即熟」。《臨汀志》云：「湯泉，在長汀縣南四五里，曰何田市，周數十丈，能熟生物。……又疏寒泉以破其烈，異向爲兩浴室，使男女有別。」《臨川志》

亦云：「天禧五年，撫州言臨川縣有古溫泉一穴，積歲堙涸，今忽流湧，民沐浴者，有疾皆愈。」還有一種因季節而變的冷熱泉，如《赤城志》云：「黃赤湖，在天台縣東南二十里。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毛骨涼凜，冬飲則如湯。」

諸如此類記載，既是中國古代礦冶史的寶貴資料，又為今日普查和勘探礦產資源提供了綫索。

六、動植物資源史料

《大典》方志中有不少動植物資源的記載。《臨汀志》云該處「地接潮梅，率多曠野，故有虎豹熊之屬，其氣候多暖，故花果之種類時序或似嶺南」，廣記南宋時當地物產，計谷之屬有秔、糯等六種，帛之屬有綾、紬、布等三種，貨之屬有金、銀、銅等十一種，花之屬有碧桃、玉蝴蝶、閃爍桃等三十四種，藥之屬有半夏、地黃、菖蒲等五十四種，竹之屬有苦、筍、筋、甜竹、斑竹等十種，菓之屬有桃、李、杏等三十種，木之屬有楠、杉、松等二十八種，畜之屬有牛、馬、騾等十六種，禽之屬有鴛、雉、鷓等二十八種，獸之屬有虎、豹、象等十五種，魚之屬有鯽、鯉、鱸等十六種。臨汀雖為僻遠山區，然物產豐富。《天台縣志》有稀見的赤眼巨魚記載，其云「赤湖，在縣西七十里，其初煙水極目。有赤眼巨魚，長丈餘，游泳其中，今不復存，湖亦半為田矣」。又《雲南志略》為元代方志，李京修纂於大德年間，記雲南植物有莎羅樹、石瓜樹、芭蕉子樹、無花菓樹等，以石瓜樹、芭蕉子樹較為奇特，並敘述其栽種、生長、食用、功效等。其云：「石瓜樹，生瓜堅實如石，故名。善治心痛，出茫部路。」芭蕉子樹，初生子不可食，移樹於有水處栽，所結子方可食之。正二月開花，紅色如牛心。結子三五寸，如皂莢樣。七月取其子，以瓶盛於火棚上使熟，剝膚而食，其甘如飴。採時去其樹，明年復其故，四五月又花，冬月依前採之。秋食惹瘴。」石瓜樹、芭蕉子樹為亞熱帶植物，《本草綱目》沒有記載，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有石瓜樹，但不載芭蕉子樹。《温州府志》

記溫地所產梅花奇品紫萼梅、黃香梅、重葉梅等甚詳。《建武志》、《湟川圖志》、《潮州府圖經志》等詳記南宋時出產在廣西、廣東的亞熱帶水果及中草藥材。這些記載，對今日恢復和開發各地傳統資源產品，是有參考價值的。

七、封建大家族史料

數世同居的封建大家族，在二十四史《孝義傳》中不乏記載，《魏書·孝感傳》記河東聞喜吳奚達「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閤門和睦，讓逸競勞」。《北史·節義傳》記博陵安平李儿「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南史·孝義傳》云：「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疏從四世同居。」封建大家族，遍及南北，但這種大家族中成員地位、分工、財產分配、紀律等，皆語焉不詳。而《豫章續志》、《瑞州府志》、《開封府志》、《江州圖經》等有唐宋時期封建大家族內部結構的詳細記載。《江州圖經》記唐昭宗大順時陳崇一門七世同居，內外二百口。家族內「立主事一人，副二人，睦上下，轄長幼，待賓親，提局務，會財用。庫司二人，行賞罰，管莊宅，送稅租，司契書，時出納。立宅庫十一人，隸主事一人。主酒漿二人，主倉碓二人，主園圃牧畜四人，主近莊禾稼、桑柘、薪炭。立開勘司一人，掌歷卜，主男女之生死婚姻排行。諸莊各置首一人，副一人，主田地耕種營殖。近莊創書堂，置掌書一人，主延師友，教成才。近宅創小學，置先生二人，授童蒙而皆以族長主之。一人學醫，以備疾病。一人學巫卜，以備

塚宅，占禱家故。有道院，擇好道者奉焚修。……然後室無私財，厨無別饌，每男女食，合坐一廣室，少者別席，不畜婢僕，人無間言。子孫有常業，鷹犬之玩，非聖之書，商販之筭，皆禁勿習」。可以看出大家族內部分工極為細緻，從耕種、收藏、衣食、居住、財產、教育、婚姻、宗教、生死都有專人掌管。陳氏一門繁衍興旺，南唐昇元中有二百口，至北宋開寶間，增至七百口，宋真宗咸平間又「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口」，北宋末竟達三千餘口。數百年間「子孫世守」而不潰散的重要原因是一家族立有「家法」。宋真宗時陳氏曾上《家法》二篇，真宗「將《家法》送史館繕寫，賜諸王公各一本」。永豐縣鄭承奉「家及五世，食指千餘，有《家範》三十三條」。《廣信永豐志》《家範》與《家法》性質類似，是家族內部法規，也是維護封建大家族的支柱。封建大家族是商品經濟不發達下的產物，貫穿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但史學領域裏尚很少涉及，相信這些史料的發掘，是有助於這一專題的深入研討的。

八、民俗史料

《臨川志》云：「臨川之俗，風流儒雅，其民樂讀書而好文詞……秀而能文，剛而不屈。」《撫州府志》云：「撫州之境，山川清麗，其俗風流儒雅，道教隆洽，地之肥瘠不等，其民勤於耕桑以自足。其士樂讀書，好文詞，尚氣節，畏清議，淳龐信厚，其天性則然，名儒鉅公，彬彬輩出。」當地居民「樂讀書而好文詞」，封建文化教育發達，自宋以來，人材輩出，有地理學家樂史，政治家、文學家晏殊、王安石，詩人謝逸、汪革，哲學家陸九淵等。《臨汀志》謂汀州「山峻水急，習氣剛毅而狷介。……農罕以耕稼自力，未免

有曠土遊民，婦不以蠶絲自工，惟事乎治游緝苧，「險隘荒陋，輕生尚武」，民風習俗，與臨川迥異。

《南雄路志》云：「郡邇曹溪，薰染老盧之教，自唐暨宋朝，名僧繼出，故俗喜奉佛，梵宇相望，他郡不及。」南雄一帶，自唐以來篤佛信教之風甚盛，可是無論《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還是正史地理志，都沒有記載。

《世說新語·言語》載王「武子（濟）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機），「卿江東何以敵此？」西晉時酪為貴族官僚的食品，江南尚未有也。同書《排調》又云：「陸太尉指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東晉初，政權南遷，酪這種食品亦由北人帶到江南，但仍未為吳人所接受。但《會稽前志》云：「酪以酥為冠，今南方亦皆作。而會稽者尤佳。會稽諸邑，又推諸暨為冠。」可見經數百年來的演變，南北人民飲食的交流，到南宋時，酪已成江南特產。

大至風尚，小至飲食，因地而異，因時而移，方志中的這些記載，多少反映宋至明初間的社會風貌。

九、古籍版刻史料

印刷術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雕板印刷起源何時，一說始於隋唐，也有主張遠溯至東漢的，儘管有爭議，而宋代無疑是印刷技術發展和繁榮的時期，《大典》方志的有關記述，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江州志》有文籍一門，其云「有天下者，備天下之書；有一國者，備一國之書。九江為文憲郡，經史百家，別於學官，藏於私塾。世所有者，未必無之。」其下分三點論述江州圖書版刻狀況。第一曰「書籍」，

指江州收藏的圖書，依經史子集排列，經部五十二種，史部三十五種，子部八種，集部二十三種，凡一百零八種。以史部爲例，有《史記》、《漢書》、袁宏《後漢書》、《漢兵制》、《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唐書》、《唐書音訓》、《五代史》、《資治通鑑》、晦庵《通鑑綱目》、《通鑑紀事》、《續通鑑長編》、南軒《通鑑論篤》、《本朝事實》、《三朝實訓》、《十三朝言行錄》、《三朝政要》、《建康實錄》、《諸葛武侯傳》、杜氏《通典》、《韓魏公家傳》、《紹興勅令》、《職官分紀》、《治迹統類》、《君臣事實》、《名臣玉府》、《冊府元龜》、《白氏六帖》、《書林事韻》、《唐韻》、《玉篇》。這些書目中，既有《史記》到《五代史》一系列紀傳史，又有《資治通鑑》、《續通鑑長編》等編年史，還有專記典章制度的《通典》和大型類書《冊府元龜》等，可謂宋以前重要史籍，一概俱全。其次曰「書目」，指江州應當收藏的圖書，共開列書名一百六十四種，以江州地方史著作最多，有熊欣《豫章志後撰》一卷、徐整《豫章舊志》八卷、雷次宗《豫章志》、張密《九江新舊錄》三卷、張僧鑑《尋陽記》一卷、王真之《尋陽記》、晁伯揆《尋陽志》十二志、《江州諸姓譜》一卷、《開寶江州圖經》、《祥符江州圖經》、《大觀江州圖經》等等，可見宋時地方史著述甚盛，並注重這類文獻的收集。第三曰「書板」，指江州學官所藏的書板，有《周子通書》、《二程文集》、《東坡大全集》等二十八種，後二種典籍卷帙繁多，可知宋時江州不僅有板刻，而且規模較大，可見江州刻書在書史、版刻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葉德輝《書林清話》未論及廣東潮州刻書事，想必是文獻不足，故隱而不述。徐信符《廣東板片記略》云：「宋代雕刻粵東寂然無聞。」斷言宋時潮州絕無刻書事。可是《三陽志》却有南宋時潮州刻書的

詳細記載，其《書籍》一門云：「郡書舊數十種，歲久漫滅，多不復存，今以見管及新刊者列之於左：大字《韓文公集并考異》一千二百板，中字《韓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通鑑總類》一千五百板，《漢雋》一百九十板，《蔡端明集》六百五十板，《趙忠簡集》四百二十五板，陳內翰宗召、徐學士鳳《北門集》三百二十板，《三山王訥齋集》一百二十板，許東潤《應龍集》二百二十板，《續談助》二百七十板，《諭俗續編》四十板，林賢良《草範》五十板，新修《潮陽圖經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大字《韻略》一百板。藥方五種：《瘴論》三十板，《備急方》三十板，《易簡方》九十板，《治未病方》九十板，《癰疽秘方》四十板，以上書板並留郡。《濂溪大成集》四百板，呂氏大圭《孟子說》三百二十板，呂氏大圭《春秋集傳或問》六百板，以上板留濂溪書院。朱文公《論孟或問》六百板，朱文公《中庸輯略》一百八十板，朱文公《家禮》一百七十板，《北溪字義》一百二十板，《呂氏易集解》三百二十板，《孝經本旨》九十板，《三陽講義》一百板，陳平湖《膠髓集》一百板，陳平湖《中庸大學太極通書說》，共七百五十板，以上板留郡學。新刊《元城劉忠定公集》一百八十板，《春秋辨傳》二百五十板，《牟心齋讀史詩古瀛丁集》五十板。」以上典籍達三十餘種，板數逾萬，除常見的經史書籍外；像《新修潮陽圖經古瀛乙丙集》、《三陽講義》等均為潮州地方文獻。陳文索《寄題漳浦縣詩》云：「漳浦從來瘴霧深，潮陽南去更難禁。」潮地下濕多瘴癘，藥方五種中有《瘴論》、《癰疽秘方》等，是防治地方病的醫籍，在潮州刊刻具有實用性。

《三陽志》板刻史料的發現，糾正了以往「宋代雕刻粵東寂然無聞」的誤解，彌補了印刷史上的空白，其所刊刻的不少典籍，不見《宋史·藝文志》和倪燦《補宋史藝文志》，可補其不足。

十、補正清人方志輯本之遺闕

宋代之前地記圖經著作繁多，惜絕大多數已佚，幸存於世者亦多爲斷簡殘篇，鳳毛麟角。爲了彌補地理學史上的損失，清代不少學者從事古方志的輯佚，力圖恢復原書面貌，乾隆間金谿王謨的《漢唐地理書鈔》和晚清善化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最爲有名。

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總目所列的先秦至唐地理著作達三百八十八種，不知是王謨「大羣已及」，沒有完成，還是「困於資力」，未能刊刻，總之現存只有七十種。今以《大典》核之，卷六八三〇《九江府志》引張野《廬山記》一條，同卷又有王績之《尋陽記》一條，卷六六九七、六七〇〇《江州志》引山謙之《尋陽記》二條，卷八〇九一《豫章續志》引南唐涂廣《豫章記》四條。前三種爲六朝地記，後一種亦爲宋前舊籍，然此四種俱不見《漢唐地理書鈔》總目，爲王謨應輯而未輯者。又卷二六〇四有晉華延儔《洛陽記》、卷一九八六五有劉宋劉緝之《永嘉郡記》、卷五四〇有梁蕭子開《建安記》等，僅見王書總目而輯本不存，今人尚可補輯。六朝遺籍，百不存一，斷璣殘璧，彌足珍貴。

陳運溶的《麓山精舍叢書》輯佚的地域僅限於湖南，而時間上延伸至宋，應輯而未輯之書甚多，今不俱舉，只對其編輯者列舉如下：宋趙善修《長沙志》據《輿地紀勝》輯得三條，編輯卷七五一六的一條。《岳州圖經》據《輿地紀勝》輯得六條，編輯卷五二六〇的一條。張聲道《岳陽乙志》據《輿地紀勝》輯得二條，編輯卷二二五六、二二六一、三五二五、三三二〇六凡七條。《郴州圖經》據《輿地紀勝》輯得四條，編輯

卷三一四五的一條。宋剛中《衡陽志》據《輿地紀勝》輯得二條，漏輯卷二二六二、二六六三、七五一六、一四七〇七凡四條。

王謨、陳運溶爲輯佚名家，「上窮碧落下黃泉」，哀輯遺籍，不遺餘力，然皆因未能利用《大典》，故輯本均存在應輯而未輯和漏輯等弊病。

從《大典》中，徐松輯有《元河南志》、文廷式輯有《壽昌乘》，現存《大典》雖不及徐、文二氏寓目之數，然亦有其漏輯者，《河南志》、《壽昌乘》各有逸文四條，俱見本書，文繁不錄。

十一、名勝文物及石刻史料

名勝古跡是唐宋以來總志方志記述的重要內容，今《大典》方志中，尤以《臨汀志》、《南雄郡志》、《江陽志》所記福建長汀、廣東韶關、四川瀘州一帶景觀，最爲勝絕。

《臨汀志》云「郡境山明水秀，川迥谷深，登臨亭榭雖不多，而景趣皆勝絕，覽者率徘徊不忍去，他郡未必有也。」其記山景云，長汀縣玉女山「四時花卉不絕，月明籟寂，隱有音樂聲」。翠峰山「壁立千仞，紺碧可愛」。其記溶洞云：「蒼玉洞，在長汀縣東三里東禪寺前，道傍兩石對峙如門，中間玲瓏岌嶮，奇怪萬狀，不減靈隱天竺，石有數名，曰石門、煙嶼、仙掌、鳩巢、抱雲、二老峰、獅子、馬鞍之類，名勝篇章最多。」在《鄞江志》中亦有關於蒼玉洞的描述。其他方志中有關溶洞的記載亦很多，《處州府志》有石鐘洞，《延平志》有玉華洞，《江州志》有玉壺洞、潛玉洞，《邵陽志》有金紫洞等。《房山縣志》記石經洞一條

甚爲重要，其云「石經洞，在北京順天府涿州房山縣城西南六十里雲居寺東。有峰曰小西天，其上有八洞，隋沙門靜琬者，發願以石鑿《華嚴》、《涅槃》諸經，至唐經成，闕於石洞，人不可見。」這是房山雲居寺石經洞的較早記載。

南雄爲嶺南僻遠之地，《南雄郡志》却詳載該地景點：

「庾嶺寒梅，即梅關也。古以其上多梅，凌寒先開，因名之。」

「凌江秋月，在郡治西，其水抱城而流，澄澈環繞，秋高月明，一色朗映，視他水爲異，故名焉。」

「官道虬松，自郡至庾關八十餘里。嘉祐間漕使蔡抗奉旨栽植，夾道陰翳，枝幹夭矯，形若虬龍。」

「靈巖龍瀑，去城北十五里。崖嶂皆石，巉絕千尺，上有飛泉瀉空，如瀑布焉。云有龍潛其巔，巖中有龍王祠，故曰龍瀑。」

「陰晴塔影，城東延祥寺有塔三影。祥符二年己酉云異人所建。有塔影堂，其三影不以陰晴見於壁間，二影倒懸，一影向上見廳堂間，吉；若見於房室則凶。」

《臨汀志》、《南雄郡志》所記偏重自然景色，而《江陽志》以記園林風光取勝。宋時瀘州有漏澤園、西園、北園等，《江陽志》對每處園苑的布局結構、景觀命名及異花名木描述細微，是研究宋代四川園林建築藝術不可多見的史料。除園林記載外，還記瀘地各處樓堂亭館，頗有景致。有晁公武所建，「雄壯爲一郡勝」的南定樓；「高揖衆山，氣象雄偉」的鎮遠樓；「居高望遠，最爲得要所」的寶山堂；「附城面江，高明爽塏」的留春館等等。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還有記載前人遺址，如鄱陽有謝靈運繙經臺，撫州有王右軍故宅和洗墨池，廬陵有文天祥讀書處等。

諸如此類，爲發展旅遊事業，提供了可靠的景觀依據。

《新安志》載「中都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馮延巳早朝詩」。《新安志》爲明志，可見李後主墨跡明初猶存。《江州志》、《九江府志》、《遼州圖經志》、《太原志》、《興化府志》等均有《碑刻》一門，以《江州志》最爲突出，其記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各縣名山勝跡、縣學書院、道觀佛寺等處的先秦至南宋的山記、洞記、亭記、驛記、廟記、殿記、塔銘、像贊、墓碣、題名、詩文凡三百數十則，每一碑刻著錄碑名，並列出撰者、書者姓名，很有史料價值，它爲普查和保護文物遺產提供了重要綫索。

十二、文學藝術史料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以及清代所編《全唐詩》、《全唐文》這四部總集，大體概括了唐代以前及唐代的詩文作品。今尋核《大典》方志，尚有其遺闕者。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張野《遠法師銘》一文，今《九江府志》有張野《廬山記》，爲嚴書失收。《寶祐濡溪志》云：「廬山縣北白石山有石洞門，在葛仙翁修行巷之西。仙翁詩曰：『白石分金井，丹砂布玉田。古今人自老，片月下平川。』所謂平川者，指巢湖也。按王喬，漢人，爲葉令，有鳧鳥之異。仙翁，晉人，名洪，字稚川，爲勾漏令，學道得仙，號抱朴子。距喬已數百年，今對弈於此，果真仙常而不

死。」此云葛仙翁爲葛洪，實誤。據《真仙通鑑》云：「仙翁姓葛名玄，字孝先。」遠氏之書僅收葛玄《空中歌》三首，葛洪名下亦無此詩，作者爲誰尚可研究，此詩爲遠書所無，可補其缺。

至于《全唐詩》的佚詩就更多了。今人孫望有《全唐詩補逸》二十卷、童養年有《全唐詩續補遺》二十卷，不少詩什即取之《大典》。《全唐詩》爲清康熙間曹寅諸人在揚州匆匆編成，其時《大典》尚爲齊全，惜不知其價值，未能利用，遺逸甚多。嘉慶間修《全唐文》吸取教訓，輯出唐文甚多，故今日《大典》中《全唐文》的佚文就甚少。

《大典》方志保存最多的還是宋人詩文，以《臨汀志》、《江州志》、《九江府志》、《處州府志》、《古藤志》、《潮州圖經志》、《古羅志》、《江陽譜》等最爲集中。今以修纂於南宋寶祐間《臨汀志》爲例，收有宋人洪芻、張憲武、郭祥正、陳顯伯、陳軒、林喬、蔣之奇、謝三回、蔡隽、鍾伯澹、孫璋、鄧遠舉、劉嶠、陳鑄、林岳、李綱、史林、李存賢、劉公弼、石英民、施子安、臧子常、胡咸、梁顏、陳曄、陳粹、趙善晤、楊方、鄭文寶、吳簡言、梁藻、湯莘叟、鄧春卿、許貽之、智孜、文雅、普濟等詩共百餘首，除洪芻有《老圃集》、郭祥正有《青山集》、李綱有《梁溪集》、蔣之奇有《丹陽集》傳世外，其餘諸人皆無別集，無論文學史還是宋人詩選很少涉及他們，但其詩什不乏清新之作，如寧化人湯莘叟「少好吟詠」，有《馬上吟》詩膾炙人口，其二云「宿雨洗山新綠嫩，曉風吹杏殘紅乾。沙頭路煖日初上，行客揚鞭不覺寒。」又如陳軒，建陽人，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官至龍圖閣學士。厲鶚《宋詩紀事》僅據《補高僧傳》、《嚴州府志》、《汀州府志》輯得詩三首，而《臨汀志》存其詩十餘首，如「南極星邊人望關，北山樓上客思家」，「樓上斜陽過似飛，樓前秋景透